

当代社会学研究丛书
SERIES OF CONTEMPORARY SOCIOLOGY STUD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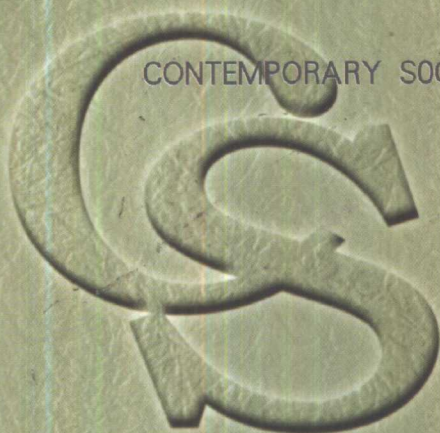
就业与制度变迁

两个特殊群体的求职过程

JOB SEARCHING, EMPLOYMENT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李培林 张翼 赵延东 著

CONTEMPORARY SOCIOLOGY



浙江人民出版社

当代社会学研究丛书

SERIES OF CONTEMPORARY SOCIOLOGY STUDY

雷洁琼 主编

就业与制度变迁

两个特殊群体的求职过程

李培林 张翼 赵延东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就业与制度变迁：两个特殊群体的求职过程/李培林，
张翼，赵延东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12
(当代社会学研究丛书/雷洁琼主编)
ISBN 7-213-02171-0

I. 就… II. ①李… ②张… ③赵… III. 职业选
择—研究 IV. C91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5369 号

当代社会学研究丛书

就业与制度变迁——两个特殊群体的求职过程

李培林 张 翼 赵延东 著

-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责任编辑 杨淑英
封面设计 王义钢
责任校对 韦 伟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激光照排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
(杭州环城北路 41 号)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1
字 数 26 万
插 页 2
印 数 1 - 3000
版 次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3-02171-0/C · 82
定 价 21.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导论 21 世纪的挑战：中国就业市场的形成和劳动关系的变动	(1)
一、全球化条件下中国断裂的劳动就业市场	(4)
二、市场化改革与劳动力市场的形成	(10)
三、转轨时期劳动关系及劳动地位的变动	(17)
四、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前景	(25)
五、中国面对就业挑战的选择	(32)
第一章 影响下岗职工再就业机会获得因素的分析	(41)
一、下岗职工工作的获得	(42)
二、研究设计与分析方法	(45)
三、影响下岗职工求职与就业的因素	(53)
四、就业状况与劳动力市场的改变	(62)
五、小结	(70)
第二章 下岗职工的求职途径与再就业	(74)
一、职工个人背景和求职途径对其再就业结果的影响	(74)
二、主要研究概念的界定及操作化	(76)

三、研究的主要问题和假设	(82)
四、数据来源与研究变量的确定	(84)
五、数据分析方法与分析结论	(89)
六、讨论	(101)
第三章 下岗职工求职过程中的择业心态	(107)
一、职工求职的意愿	(107)
二、职工对自己实现再就业的信心	(112)
三、职工求职时考虑的主要因素	(115)
四、下岗职工再就业时的预定工资情况	(125)
五、职工心目中理想的求职途径	(128)
第四章 下岗职工经济地位的自觉与社会稳定	(138)
一、失业率与社会动荡	(139)
二、下岗职工对自己经济生活水平的主观认定	(141)
三、不同生活水平的下岗职工对未来生活的预期	(145)
四、自我感知的经济地位与社会稳定	(151)
五、小结	(156)
第五章 农民工的职业获得与社会流动	(160)
一、人力资本与“前农民工”的职业结构	(161)
二、初始职业对当前职业获得的影响	(165)
三、顽强流动的社会动力	(175)
四、小结	(182)
第六章 农民工求职中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	(186)
一、作为社会流动的民工流动	(187)

二、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和交往方式	(193)
三、农民工的生活状况	(202)
四、农民工的社会分层和社会地位	(205)
五、结论性评论和农民工发展前景的展望	(213)
附录 下岗职工和企业领导访谈实录及点评	(217)
一、对企业领导的个案访谈实录	(218)
点评一：“一厂两企”的现象	(218)
点评二：国有企业领导实行年薪制的困难	(222)
点评三：社会公正原则与下岗机制的矛盾	(224)
点评四：成本是企业的生命线	(227)
点评五：国有企业的两种就业市场	(232)
二、北市制药厂下岗职工访谈实录	(236)
点评六：就业方式的转变和就业的统计	(236)
点评七：关注从“下乡”到“下岗”的一代人	(247)
点评八：下岗职工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为何难？	(252)
三、北市衡器厂下岗职工访谈实录	(254)
点评九：不同年龄段对“下岗”态度的“代差”	(261)
四、北市轮胎厂下岗职工访谈实录	(265)
点评十：男人下岗后的家庭关系	(265)
点评十一：下岗职工与进城民工的就业比较	(269)
五、北市拖拉机厂下岗职工访谈实录	(274)
点评十二：对生活前景的预期决定消费的信心指数	(275)
点评十三：企业垮了是谁的责任？	(279)
点评十四：城市生产的“后工业”和农村消费的	

“前工业”	(290)
六、北市特种车厢厂下岗职工访谈实录	(304)
点评十五：再就业谋职中的“社会资本”和“信用”	(308)
点评十六：部分下岗职工的双重“身份”	(316)
七、北市瓷器厂下岗职工访谈实录	(323)
点评十七：“老工业基地”与“新经济”	(325)
 参考文献	 (331)
后记	(343)

导论 21 世纪的挑战：中国就业市场的形成和劳动关系的变动

引言

在 20 世纪末叶，一个新的魂灵在全世界游荡，这就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在各种大众传播媒体上，包括论坛、报刊、书籍、影视、网络等等，“全球化”在短时间内成为一个使用频率非常之高的概念和名词。尽管人们在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上还莫衷一是，但这似乎并不影响人们使用它来描述各种“新趋势”的热情。在世纪末学术界有人提出“历史的终结”的断言时(Fukuyama, 1992)， “全球化”就像是一扇新打开的门窗，让人们看到历史开启新的未来的魔力。

在“全球化”这个概念提出之前，西方世界一直是用“现代化”来概括轴心文明在全世界的扩张趋势，即某种普遍性的过程。在出现各种伴随“现代化”的社会问题，从而学术界提出各种对“现代性”的批判之后，“全球化”似乎成为在“新经济”的基础上替代“现代化”对新的发展趋势的概括。但是，如果仅就基本假定来看，“全球化”与“现代化”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它们都隐含着一种假定：即在西方社会首先实现的社会转型，以及与此相联系而形成的各

种制度安排,将必然地、自然而然地被一切正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或现代社会所接受和效仿,轴心文明形成的游戏规则,将成为通行于全世界的规则(Eisenstadt,2000)。

然而,“全球化”概念的提出,又的确有它不同于“现代化”的意味:(1)根据“现代化”的理论,现代化的后来者一般来说要步现代化先行者的足迹,走过现代化的历程,处于现代化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其发展策略应符合那个阶段的特定要求;而“全球化”是一次重新“洗牌”,认为在新技术条件下,任何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都不再可能按部就班地走过现代化的传统上的各个阶段,其发展策略必须符合统一的全球化的新趋势,不能游离于世界普遍游戏规则之外。(2)“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各个层面的社会转型,即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世俗化、理性化等等;而“全球化”的核心内容,是在信息化和网络化的推动下,统一的市场规则在全世界的通行,“全球化”意味着一种新的普遍性的到来,而处于不同发展时点和阶段的社会特殊性,必须融入这种普遍性才能获得存在的和成长的权利。(3)“现代化”的理论还是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谈论问题,而“全球化”的理论则试图动摇民族国家的界限;“后现代性”试图用文化的多样性来取代“现代性”的传统普遍性,而“全球化”则力图用新的普遍性更新“现代性”的传统普遍性。(4)“现代化”的理论建立在一系列的经济社会规则的基础上,如资本积累、经济周期、福利分配、社会分层、公共领域等等,而“全球化”理论则强调,这些领域中的传统规则正在改变,一套新的普遍性规则正在形成。

处在这种背景和趋势下的中国,面临着非常艰难的选择:其一,受中国几代人现代化之梦的推动,中国民众中具有强烈的赶超意识,希望中华民族能够成为世界上受尊重、有影响的民族,也希望尽快过上现代的舒适生活,这种高期望推动着对经济增长实行超乎寻常的强刺激;而实际的现代化过程,由于发展起点低、人口

众多和人均资源匮乏，可能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任何不切实际的赶超战略，都可能带来适得其反的结果。其二，中国期望通过对外开放融入国际社会，更渴望分享现代文明的各种成果，以便能够实现发展阶段的跳跃；但以弱势地位面对强势国家，又充满了各种疑虑和担忧，在近现代史上历经战争、欺辱、内乱和劫难之后，中国人对不要再折腾和不要再受蒙骗的希冀成为一种凝重的大众心理。其三，中国已意识到，承认、遵循和参与制定世界的普遍游戏规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但中国自身正处于加速工业化和市场化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刚刚建立起来，很多行业和经济领域还缺乏国际竞争力，全面开放以后，它们能否经得住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其中利害得失也还有各种未定之数。

在中国众多的需要做出艰难选择的问题当中，就业可能是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目前中国的人口已达到近 13 亿，而直到 21 世纪 30—40 年代，中国人口总量的增长才能达到逆转的峰值，根据预测模拟，届时中国的总人口将达到 14.5 亿—15 亿人（刘金塘，2000）。新中国成立后的 50 年，中国的发展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成功地解决了十几亿人的吃饭穿衣问题，使大多数人过上温饱和小康生活，这对全世界都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在今后的 50 年，中国要解决的最大难题之一，就是如何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使具有劳动能力而又希望工作的人都能够就业。从近期和长期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的就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1）农村还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要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从土地劳作中转移出来；（2）由于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存在，在农村还没有实现工业化的时候，某些老工业基地却出现走向后工业化的征兆，传统产业开始衰落，大量产业工人下岗；（3）国有企业的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提高效率的要求使国有企业不得不进行大幅度的人员精简；（4）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近 8 万多亿元，基数的加大和对粗放扩张战略

的放弃可能会使今后很难再达到 10% 以上的增长率,就业机会的增加会变得更加困难;(5)产业结构的调整、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信息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都使技术和资本对劳动的替代过程加速;(6)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某些行业的劳动就业将会受到外国资本和技术的挤压。这些挑战使全世界都在关注着,中国如何解决自己的就业问题,就像当年全世界都在关注着中国如何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一样。

一、全球化条件下中国断裂的劳动就业市场

1. 二元社会结构下的城乡壁垒

到国外发达国家去过的中国人都有一种强烈的震撼,这种震撼不是来自中国的大城市——上海、北京与纽约、巴黎、东京、伦敦等国际大都市的比较,而是来自发达国家的农村与中国广大农村之间发展程度的巨大反差。中国城乡之间巨大的发展差距,已经远远超越了现代化过程中城乡差距的合理范围。在中国的大都市,无论是建筑风格、商品广告、生活和娱乐方式还是谈论的话题和价值观念,你都可以感到现代文明的气息;但在欠发展的农村,人们对现代文明似乎还非常陌生,他们的生活与大都市存在着几十年的发展差距。

由于长期实行的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中国的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发生严重的背离。到 2000 年,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的比重已经降到 17% 以下,农业和非农产业的产值比例结构约为 17 : 83,但农业和非农产业的劳动力比例结构仍然是 50 : 50,而乡村和城市人口的比例结构大体是 70 : 30。城市化水平如此严重地滞后于工业化水平,这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都是很罕见的。不仅

1. 25 亿乡镇企业职工至今依然是农民身份，就是已经在城市就业的 6000 万—8000 万民工，在统计上和体制待遇上也依然属于乡村人口。

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存在着一道无形的壁垒。尽管在沿海发达地区，这种壁垒已经被发展的潮流冲决得支离破碎，但在内陆的广大区域，都市和农村还几近是两个世界，农民要跨越城乡之间的壁垒，只有非常有限的途径。

城市和农村的差异，不仅仅是发展程度的差异，同时还包括体制上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几乎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户籍、福利保障、居住、教育等等，当然也包括就业。

2. 城乡壁垒松动后的断裂就业市场

改革以前，在严格的户籍管制下，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完全是两种就业制度。除了每年极少数的“农转非”配额，城市的劳动供给几乎完全依赖大中专学校和职业学校的毕业生以及城市户籍的复员军人和转业军人。在农业“以粮为纲”的发展战略下，农民失去了择业和经营的自由，他们的劳动被束缚在有限的土地上，随着人口的增加和耕地的减少，农业劳动的人员过密化状态日益严重。改革开放前的 1952—1978 年的 26 年中，中国农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仅从 83.5% 下降到 70.5%，平均每年仅下降 0.5 个百分点；而改革开放后的 1978—1998 年的 20 年中，中国农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从 70.5% 下降到 49.8%，平均每年下降 1.03 个百分点。

改革开放后对农村就业发生最大影响的两项，一是允许农民自主经营和自由择业，二是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前一项政策使农村产生了 1.25 亿乡镇企业职工，后一项政策使城市出现了 6000 万—8000 万进城民工。

在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和国有企业实行减员增效政策之前,中国城市的就业市场发展非常缓慢,以至于就业的市场化程度大大低于商品的市场化程度。形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有部门用人制度的改革步履维艰。中国的改革是沿着先易后难的渐进方式进行的,改革一旦触及原有利益格局的“硬核”,就很难推进。发展非国有经济以及允许农民自主择业和进城务工经商,这是在保持福利存量不变的情况下加大福利的增量,所以还比较容易进行。但要改革触及国有部门的用人制度,实行减员增效,就势必调整福利存量,触及原有利益格局,这就难以避免发生各种利益冲突。但改革开放后城乡壁垒的松动、农民的进城务工经商以及国有部门的人员精简,毕竟使中国就业市场的形成大大加速了。

然而,处在体制转轨和结构调整中的中国,目前所形成的就业市场,还是一种断裂的和残缺的就业市场。城市和农村断裂成两个就业市场:在农村就业市场,就业要求较高的城市户籍人员几乎不参与竞争;而在城市就业市场,除了沿海地区少数迅速发展的镇和小城市,农民户籍的人员还只能参与有限的竞争。就是城市就业市场本身,在现实中也断裂成三块:一是在城市的正式部门,包括所有的国有部门、大公司以及知识技术密集部门,这主要是大中专以上的毕业生和国有部门下海、跳槽的人员竞争的就业市场,一般有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和较高的工作稳定性;二是在城市的非正式部门,包括城市的一般非国有领域中待遇相对较好或劳动强度较轻的部门,这主要是国有企业分离出的人员竞争的就业市场,一般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但工作相对稳定;三是在城市非正式部门中待遇相对较差或劳动强度较高领域,如企业中从事苦、累、脏工作的体力工人以及建筑工、装修工、矿工、修理工、商贩、餐饮业服务员、保姆、废品收购员等等(何景熙,1999),这主要是进城民工竞争的就业市场。^①

这些就业市场的断裂块,尽管具有相互交叉的领域,但却不存在统一的劳务价格、社会保障制度、劳动用工制度以及劳动力供求关系,这就使在某项政策下对劳动力市场的调整信号,并不能在整个断裂的劳动力市场得到反应,有时还会有适得其反的结果。例如,为了使城市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②获得更多的再就业机会,有的城市采取限制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措施,但实际结果是,下岗职工宁肯没有工作也不愿干农民工干的活,限制农民工进城的措施非但没有缓解下岗职工的就业困难,反而使某些领域出现劳动力供给的短缺或劳务价格的升高。所以,研究和分析中国的就业问题,必须从中国断裂的就业市场这种现实出发,探讨其中的相互关系和变化规律。

3. 城市社会就业受到城市化和后工业化的双重冲击

在中国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和城乡之间存在巨大发展差距的情况下,让人十分费解和疑惑的是,不仅商品市场出现了断裂(城市家用电器市场饱和,农村却是购买力不足)、就业市场出现了断裂,发展阶段也出现了断裂:在落后农村地区工业化刚刚起步、广大农村尚未实现工业化的时候,大城市、特别是老工业基地却出现许多后工业化社会的特征。例如,传统技术条件的资源产业和制造业出现衰落趋势,这些领域大量裁减员工;而金融、保险、旅游、环保等新兴服务业迅速发展;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传统的非营利的服务业也具有了巨大的发展潜力;特别是与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密切相连的产业,产生跳跃式发展的前景;蓝领职工(非专业非技术工作岗位)的需求大大缩减,而白领职工(与新兴产业相连的专业技术岗位)的队伍迅速扩大……

从产业结构上看,有两个指标是城市社会开始步入后工业时代主要征兆:一是从 1994 年开始,在全国全部从业人员中,第三产

业从业人员所占的比重(23.0%)有史以来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所占的比重(22.7%),此后差距逐年拉大,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到1999年,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是26.9%,第二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是23.0%;二是到1996年,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二产业所占的比重达到顶峰(49.5%),随后出现了所占比重下降的趋势,而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出现持续增长的势头,虽然二者所占比重的差距仍高达16个百分点,但差距的缩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国有工业作为第二产业的主体,其从业人员也在1995年达到历史的最高峰4521万人,此后就进入了缩减的轨道,到1999年已缩减到3800万人以下。

在这种情况下,城市社会的就业受到城市化和后工业化的双重冲击:一方面,在城市化的压力下,大量农村富余的农业劳动力涌入城市,城市需要为他们开辟新的就业市场的空间;另一方面,在后工业化的压力下,城市要在新兴产业领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便容纳由于传统产业的收缩而被闲置的劳动力。特别是面对某些后工业化的特征,很多人产生了疑惑:中国还是发展中的国家,总体上还处于工业化的中期,很多农村地区的工业化才刚刚起步,怎么能够侈谈后工业化?但中国经济社会的复杂性就是如此,这是由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所决定的。

4. 就业问题可能会成为发展的长期“瓶颈”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一个劳动力在总体上剩余的国家。不仅农村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城市中也存在大量没有工作岗位的劳动力。早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一般都是在完成工业化以后才面临老龄化社会到来的问题,而中国由于人均预期寿命的提高和长期实行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在总体上尚未实现工业化的时候,老龄化社会却过早到来,65岁以上的人口已超过总人口的

7%这一临界点。据 1998 年 1‰人口变动抽样调查，中国劳动适龄人口的总负担系数已接近 50%，达到 46.50%，其中负担少儿系数为 35.61%，负担老年系数为 10.89%。也就是说，差不多每一个劳动适龄者都要负担一个少儿或老人的生活（假设老人没有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失业和没有工作岗位的人越多，就业者身上的负担就越重，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负担也就越重。所以，中国今后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的持续发展，也可以说取决于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决劳动适龄人口的就业问题。

中国作为一个后起飞的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在资本和技术上都不存在比较优势，在各种生产要素中，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大概就是充分供给的价格较低的劳务。目前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与 GDP 的比值）一般在 30%—40%，对外贸易的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非常明显。在出口商品中，目前已基本实现了工业制成品对初级产品的替换，初级产品在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已不到 10%，但我们出口的工业制成品，基本上都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即便是从今后 10 年的发展来看，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大多数也仍将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国要实现出口产品中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替代，并不是短期可以完成的，因为这并不仅仅取决于中国自身技术的提高和资本的积累，而且还取决于你哪方面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这样，中国在国际竞争中如何发挥竞争优势的问题，也可以转换为中国如何利用劳动力的问题。利用得好会形成中国的竞争优势，而利用得不好则会成为我们长期的发展“瓶颈”，就业问题将会长期困扰中国。

二、市场化改革与劳动力市场的形成

中国的就业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如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还在于如何形成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提高劳动效率,以便在国际上具有劳务竞争优势。如果没有劳动力市场的充分竞争,即便是单个劳动力的劳务价格较低,但由于在岗富余人员的存在而使总体劳务价格较高,中国也会丧失在劳务价格方面的竞争优势。从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前景并不乐观。

1. 经济增长的放缓对就业的冲击

就业机会的创造和增加,虽然取决于诸多结构性变量,但在中国工业化的过程中,经济增长一直是最基本的决定性的变量。一般来说,一定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就业增长也是一定的,而且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还可能降低。从今后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可能会有所放缓。这是因为经济增长的基数扩大了。改革初期的1980年,中国GDP仅有4518亿元,增加几百亿元就可达到10%的增长速度;到1990年,GDP达到18598亿元,增长10%要增加近2000亿元;而到1999年,GDP达到8万多亿元,增长10%要增加8000多亿元。二是从短缺经济到过剩经济的转变以及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转变,使中国不得不放弃过去的外延扩张、粗放经营的发展模式,从追求增长速度转而追求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中国正在从振动波幅较大的高增长时期转到平稳发展的中速增长时期,在这个时期,8%的增长率就是相对较高的增长率了。1981—1990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9.0%;而1990年到1997年的7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长11.2%,从业人员年均增长